

一座为和平而生的法律图书馆

——荷兰海牙和平宫图书馆

□ 张 彤

和平宫图书馆坐落于被誉为“世界法律之都”的荷兰海牙，馆内收藏了超过100万卷关于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外国法、国际关系及外交的书籍，是全球最大且最负盛名的法律图书馆之一。自1913年正式落成以来，和平宫图书馆历经两次世界大战，始终秉持着以国际法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崇高理想，见证着国际法治百余年的发展历程。

为解决国际争端而生

和平宫图书馆与和平宫的历史发展深度交融、密不可分。19世纪末，帝国主义国家间矛盾逐渐激化，俄罗斯在大国竞争中渐落下风。为了限制他国军备发展，俄皇尼古拉二世借着彼时国际和平运动高涨的声势，提议召开国际和平会议。1899年，中、俄、英、法、美、日等26国代表赴海牙参加第一次海牙和平会议，会上通过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并依据该公约达成协议，在海牙设立第一个世界性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常设仲裁法院。常设仲裁法院最开始的办公地点是海牙一栋租金仅100英镑的简朴小楼。为了能与常设仲裁法院的宏伟愿景相匹配，各国最终决定为其专门建造一幢法院大楼，其中就包括一座专业图书馆。这一建筑群作为世界和平的象征，最终被命名为和平宫。

从兴建伊始，和平宫就被赋予了超越国界的意义。筹建委员会举办了面向全球的设计竞赛，法国建筑师科多尼尔从216名投稿者中脱颖而出。他笔下的和平宫由花岗岩、砂岩和红砖建成，融合了欧洲文艺复兴和哥特风格，饰以象征和平与正义的符号，彰显出华美隽永的风华。1907年，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确认这座建筑承载了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景，象征着世间的普遍善意和希望，故各国决定捐赠建筑装饰材料和代表本国的艺术品作为支持。例如，意大利提供了大理石，巴西运来了稀有木材，中国捐赠了珍贵的景泰蓝瓷瓶，钟楼上的时钟来自瑞士，铭刻着“愿吾之钟声宣扬和平之音”。和平宫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但具象化了国际社会对和平理想的共同追求。

和平宫图书馆的首要职责就是为和平宫内的国际机构提供用于法律研究和法理论辩的资料。它既是国际法知识的重要搜集者、保管者，也是百



余年来国际法治实践的参与者 and 见证人，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常设国际法院都设在和平宫。作为联合国六大机构之一和最主要的司法机关，截至2026年3月，联合国国际法院已发表了160份判决书和31项咨询意见，将国际法治带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服务国际法治的文献典藏

自建成以来，和平宫图书馆一直作为国际法标准图书馆为国际法律界提供服务。1916年，荷兰著名法学家雅克·奥本海默之女埃尔莎·奥本海默为和平宫图书馆设计了《和平宫图书馆目录》，这一目录成为图书馆进行各类出版物分类的核心指南。在1916年至1952年间，目录学家雅各布·特耳默伦继续编纂《和平宫图书馆目录》，形成了一个由7卷本组成的庞大谱系。从1980年起，为了优化信息检索，图书馆又在目录中添加了一个包含约4200个关键词的系统性词库。关键词提供英语、法语、荷兰语和西班牙语版本，并且内含与其他词语或术语的层级关系，建构了一个国际法的知识网络。虽然自2020年开始，图书馆的自动化系统不再直接支持这套国际法系统分类法，但它依然全面反映了图书馆的馆藏结构。今天，和平宫图书馆的馆员们依然潜心于国际法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例如，图书馆常年提供学术研究指南，不仅提供相关细分领域的精简介绍，

还紧跟学界最新动态，筛选、推荐特定的书籍、文章、数据库以及其他重要资料，为国际公法与私法、国内法与比较法、国际关系、外交以及战争与和平问题研究提供指引。图书馆还提供了它认定的200家最顶尖国际法期刊的名录。通过对各类文献的搜集、筛选和编录，和平宫图书馆在国际法律界保持着长久和独特的影响力。

和平宫图书馆以其丰富的国际法典藏而享誉全球，同时收藏着大量比较法与各国法律文献，以及外交史和冲突地区历史资料，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收藏是格劳秀斯特藏、和平运动特藏。格劳秀斯是17世纪著名荷兰思想家、国际和平主义的奠基人之一，被许多国际法学者誉为“国际法之父”。1914年，海牙著名出版商马丁努斯·奈霍夫将其个人收藏的格劳秀斯巨著《战争与和平法》捐赠给了和平宫图书馆。这套藏品包含44个版本，包括拉丁文的原著，以及法文、英文、德文和荷兰文版。其中一本是1625年首版第3次印刷本，尤其珍贵。和平宫图书馆随后不断扩充关于格劳秀斯的收藏，包括1609年的《海洋自由论》和1631年的《荷兰法学导论》，甚至收录了他在语文学、历史学、神学以及诗歌方面的著作，最终编纂了涵盖所有已知印刷著作版本的《胡果·格劳秀斯印刷著作书目》。

和平宫图书馆的和平运动特藏是关于1900—1940年间为世界和平而奋斗的诸多团体和个人的珍贵资料。这些资料包括相关书籍、小册子、传

单、会议报告、剪报、信件和照片，大部分为荷兰文，也有英文、德文、法文和其他语言的书籍和文件。这一特藏收录了约1500件藏品，重现了重要的历史事件，指向了国际法治所追求的和平主题。这些藏品被编纂成《和平特藏——和平运动相关档案集》，于1993年和2011年两次出版。2004—2005年间，荷兰皇家图书馆的国家保存计划为这些藏品制作了微缩胶片，并开展了大规模数字化工作。

数字化时代的国际法传播中心

和平宫图书馆不仅为常设仲裁法院、过去的常设国际法院以及今天的联合国国际法院提供文献支持，还为同处于和平宫的海牙国际法学院提供服务。如今，和平宫图书馆向社会大众打开了大门。只要持有效身份证件并缴纳50欧元的年费，就可以办理图书馆的阅览卡。2007年，一座现代风格的新图书馆大楼在和平宫的花园中拔地而起，通过一座玻璃廊桥与古老的砖砌主楼相连。阅览室设施齐全，休息区配有舒适的沙发、扶手椅、茶几，以及当天的《世界报》《时代周报》《卫报》等报纸。与休息区隔厅相望的历史阅览室收藏着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宪法、法典和法规，并常被用于举办讲座及其他特别活动。和平宫图书馆已然成为海牙一处独一无二的城市公共空间。

未来，和平宫图书馆将不再仅以书籍和信息为核心，而是更加注重受众的感受。为了打造更好的数字化用户体验，当前和平宫图书馆已经进行全面更新，积极拓展服务范围，提供涵盖电子期刊、电子图书、多媒体资料等在内的数字资源访问权限，并不断升级在线目录，大幅提升查全率与查准率，节省用户检索时间。数字革命让时间、地点与行为可以分离，这使和平宫图书馆不仅是借阅书籍的实体场所，更成为全天候、跨国界传播国际法话语的知识中心。



正大立心

《从政名言》有言：“大丈夫以正大立心，以光明行事，终不为邪暗小人所感而易其所守。”所谓“正大立心”，首先是指“使万物各得其所”的大志，以及随之而来的“忠诚为国之心”，故《从政名言》特别推崇范仲淹，认为他之所以能够“事业显著，而名望孚动于天下”，正是因为怀有“一片忠诚为国之心”。

忠诚为国，就要尽忠职守。薛瑄认为，朝廷“设官之本意”，是为了让“从仕者”去“养人”，但“今之从仕者”往往拿公职来“养己”。基于此，发出了如下质问：“有官戚剥民以自奉者，果何心哉？”表达了对“假官柄以济贪欲”的强烈反对。做官尽忠职守是本分，职责履行得再好，也不能自矜功伐。对于一些做成了点事情就“数数为人言之”的官员，薛瑄给出了“陋亦甚矣”的评价。同时指出，古代的圣贤即便“功满天地，德冠人群”，都能够“若浮云之漠然无所动其心”，把所有的事情都看作“分所当为”。

“富贵易至溺人”，如果一个人总是“交驰于声利之场”，那么正大之心就“存焉者寡矣”。《从政名言》建议，官员在本职工作外，不宜有太多社会活动：“守官最宜简外事，少接人，谨言语。”薛瑄直言：“不可妄交非类，以坏名节。”尤其要警惕那些善于溜须拍马的人：“不可因人曲为承顺而遂与之合”，只有“以义相接”的人，才“可以与之合”。很多官员之所以“取不义之财”，往往是“欲为子孙计”，这是一种“惑之甚”的做法。“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不义之财即便“积金如山高”，也一定会被子孙迅速散尽，甚至带来灾祸。

薛瑄将官员的廉洁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二是“尚名节而不苟取”，三是“见理明而不妄取”，这类人把“不妄取”视为自己的本分。薛瑄认为，一个深知为官本分、唯恐自己不能尽忠职守的人，是根本没有心思去作奸犯科的。而一个人如果以正大立心，便会“有凤凰翔于千仞之气象”，而“不为区区声利所动矣”。

光明行事

所谓“光明行事”，首先是指处理政务“一出于天道之公”，唯其如此，才“足以服人”。“为政以法律为师，亦名言也。既知律已，又可治人。”为此，薛瑄建议从政者“凡国家礼文制度法律条例之类，皆能熟视而深考之”，以便使事情“无瑕疵之可议”。

“法者，天讨也。玩法所以玩天也，敢不敬乎！”对于法律应有敬畏之心。要避免“玩法”，就要法立必行，“法立而行，则人不玩”。如果“立而不行”，那么一定是“适足以启下人之玩而已”。对于拿法律做交易的“卖法”行为，薛瑄认为“卖法”会“使良善之冤抑不伸”，“不惟不能治奸顽，而又所以长奸顽”。此外，执行法律要公私分明，既不可“假公法以报私仇”，也不可“假公法以报私德”，应一切以法律为准：“或重或轻，付之一心可也。”这是“光明行事”的第一层意思。

在立法层面，“中者立法之本”。立法时应以“公平正大”为原则来“制其轻重之宜”，不能“因一时之喜怒而立法”，否则就会“不得其平”。这也是“光明行事”的第二层意思，即“作官，一事不可苟”，所有事务都应处理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一事苟，其余无不苟矣”，因此“事无大小，皆当致谨”。谨慎行事不是胆小怕事，处事不仅要“为之以艰难”，还要“断之以果决”。

“光明行事”的第三层意思，是指官员要有敏锐的洞察力。“识最先，作事次之。”因为“去弊当治其本”，而高明的“识”是准确抓住根本的前提。“事才入手”，便需要“思其发脱”“应事最当知几”，无论是高瞻远瞩，还是把握时机，都有赖于“识”的引领。基于此，薛瑄认为官员必须“通经有学术”，如果“不学无术”，那么即便“有小能”，也无法

以正大立心，以光明行事

薛瑄《从政名言》中的为官之道

□ 李毅

“达大体”，从而在更高的水平上处理政务。

诚敬爱民

在官民关系问题上，《从政名言》最大的特点在于倡导官员以诚敬之心对待民众。薛瑄认为，一个一贯真诚、忠信的人，往往“言出而人信之”。至诚之人一定能够获得民众的认可和拥护，相反，“不能感人，皆诚之未至。”他读到《尚书》“无轻民事，唯难；无安厥位，唯危”之言时感叹道，无论是“处已接物”，还是“事上接下”，“皆当以敬为主”。

薛瑄认为官员对民众应有“仁爱之心”。他常以《左传》中“视民如伤”之言自勉，认为官员应当像爱自己的亲属那样去爱护民众，这种意识“当铭诸心”，“无时而忘”。薛瑄指出，古人所讲的“王道”，其本质就是“真实爱民如子”，而只要有一个人“不获其所”，古代的圣王就会“为之戚然不宁”。“圣人之仁”尤其表现在“不虐无告”“不废困穷”。孟子讲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官员应该首先做到。

士大夫应以天下为己任，即便是最基层的官员，如果“存心于爱物”，也会“必有所济”。这是推行“仁政”的基础。薛瑄坦言，一些政策可能不能保证惠及所有人，但官员“心当常存于厚”，不断去思考能够为更多人带来福祉的措施。为此，官员不可懒政，如果官员“务省事”，那么很多民众就会因为无法得到及时的帮扶而陷入原本不该陷入的困境境地。当然，官员也不能用过多的政令干扰民众的正常生活，“人好静而扰之不已，恐非为政之道”。

上情下达、下情上传对治理亦很重要。“天地不交，无以成化功；上下不交，无以成治功。”站在官员的角度，便是“为政，通下情为急”。薛瑄认为天下最可忧虑的情况，莫过于“下有危亡之势，而上不知”。官员不应高高在上，而应切实俯下身予倾听民意。此外，官员对于身边人的说法“不可偏听”“不可轻信”，一定要通过一手材料来“审是实”，避免自己被蒙蔽。同理，下级官员也应做到不欺骗上级，因此薛瑄将“不欺君”“不卖法”“不害民”并列为“做官持己”的三大要点。

薛瑄曾以“居官七要”来总结自己的心得：“正以处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长，信以接物，宽以待下，敬以处事，此居官之七要也。”其论从政不尚空谈，以心性修养为根基，将道德自律落到居官理事的实处，立论鲜明、持身严正，体现出传统儒臣清正端方的政治品格和深邃切实的理论思考。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



（上接1版）

全链条培育体系具有以下几方面特征。首先，体系构建的关键在于全链条，不是只依靠某一环节的单点突破，而是需要探索多元技术路线、典型应用场景、可行商业模式、市场监管规则等各个环节的无缝衔接与协同发力。例如，有的地区明确提出通过平台建设、科研攻关、企业创新、成果转化、场景应用等多个方面发力，促进形成从技术突破到产业应用的完整闭环。其次，从经济和产业发展规律来讲，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出的未来产业发展方向众多，在要素资源相对有限的条件下，发展未来产业不可能面面俱到、平均用力。培育体系需要主动适应未来产业的不确定性，建立健全动态甄别评估调整机制，积极研判发展态势，努力甄别重点领域，在此基础上及时调整战略布局。再次，未来产业培育周期相对较长、不确定性高，需要针对不同类型和不同阶段未来产业的发展需求，提供更加精准化差异化的政策支持，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支撑培育体系。最后，培育体系不仅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而且要提升人才、资本、数据等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尤其是提高协同配置效率，形成多个链条相互促进的创新发展生态。例如，有的地方提出构建四位一体工作机制，即项目经理团队负主责、重点任务清单突破、未来产业基金赋能、未来产业集群

聚区支撑。

构建全链条培育体系的重点举措

构建未来产业全链条培育体系，是涵盖科技创新、产业发展、金融支持、人才供给的系统性工程，是“十五五”时期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为了降低技术发展路径选择的不确定性，解决未来产业技术路线难以把握、市场用户接受度不够高等问题，应在探索多元技术路线、典型应用场景、可行商业模式、市场监管规则等方面协同发力，在战略上聚焦重点择优发展，在路径上重视因类施策、梯度培育，在保障上重视投入增长与风险分担机制建设等。

强化原始创新供给，筑牢未来产业技术根基。增强对未来产业技术的预见性，精准把握前沿技术演进方向，加大对量子信息、脑机接口等前沿领域支持力度，充分发挥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用，开展体系化技术攻关。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突出创新贡献与转化实效，构建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协同攻关、联合创新的良好生态。推动东部地区发挥科技人才优势打造创新策源地，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创新高地上，区分不同领域布局一批未来产业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基地，引导中西部及东北地区依托产业基础与资

源禀赋推进科技成果转化与中试工作。

健全未来产业长期稳定投入机制，优化耐心资本生态。为降低产业投资回报的不确定性，推动解决缺乏早期投资、长期投资等问题，应有序发展创业投资，统筹建设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鼓励各类经营主体和社会资本积极投入未来产业发展。引导多种来源的长期资本加大对未来产业早期项目的关注，持续优化项目盈利考核机制，更多以长期技术突破与产业贡献为评价标准。支持商业银行推广知识产权质押、股权质押等专项产品，培育形成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良好投融资环境。结合地方相关成功经验，优化推广“拨投结合”等支持引领性、颠覆性原创技术突破的体制机制。

协同推进市场准入、场景培育、要素配置三位一体改革。建立未来产业相关典型应用场景清单，围绕智能制造、绿色低碳、智慧健康、智能网联等领域开展示范应用，加快培育标志性产品与头部企业，积极推动在城市治理、公共服务、重大工程等领域为新技术新产品提供早期应用示范场景，充分考虑不同阶段产业发展的多元需要，健全适应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管理办法，持续完善应用场景创新激励机制。积极参与脑机接口、量子科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统筹推进超大规模智算中心、量子通信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布局与建设，促进算力、数据、

技术等有序开放和高效配置，探索适应天空、频谱、深海等新型要素配置的体制机制。围绕未来产业发展需求，不断优化与未来产业相关的学科设置，鼓励“校企合作”联合培养人才，强化战略科技人才、高端工程技术人员和专业投资人才、项目经理人队伍建设。

构建区域协同发展格局，激活各类经营主体活力。为了降低未来产业发展生态发育不全导致的不确定性，尤其是要解决经营主体少、产业链上中下游协作网络不健全等问题，要加快推动创新资源向创新型企业汇聚，进一步壮大高科技领军企业，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培育瞪羚和独角兽企业，加快营造良好产业生态和市场生态。针对企业从创办到发展壮大的一生周期，构建覆盖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的梯度培育体系，通过精准施策助力企业稳扎稳打、健康成长。同时，引导各地方立足自身禀赋和优势，因地制宜、错位发展未来产业，特别是依托科教资源优势突出、产业基础雄厚地区建设一批未来产业先导区，推动实现优质要素资源集聚、产业互动高效紧密、创新生态体系完备、基础设施更加适配。鼓励未来产业的链主和骨干企业牵头组建创新中心，前瞻谋划布局新赛道，积极加大研发投入，搭建共性技术平台和强化技术储备，持续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创新。

（作者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投资研究所副所长）